

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

李永贤

【摘要】容闳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经过十六年的酝酿和努力，他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但十年后以中途夭折而告终。这除了与当时国内外大环境有关之外，也与时代造成容闳的双重人格有着密切关系。但是，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影响并没有随其夭折而停滞，它为中国近代造就了一批有用人才，对之后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和中美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容闳 留学教育 派遣留学生 “教育计划”

【作者】李永贤，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管理杂志社编辑、教育学博士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阴，号纯甫，英文署名 Yung Wing（又作 Jung Hung），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是我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西学东渐记》是容闳用英文撰写的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回忆录，原名《My Life in Chinese and America》，190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后由主编《小说月报》的恽铁樵与徐凤石共同翻译并于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为《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叙》，这一译名准确地表达了容闳毕生为之奋斗的人生主题及其生命底蕴。容闳的一生是实践的一生，在接受了完全的西洋文明教育后，为改革和复兴中国而力促西学东渐，在近代史上为中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留学生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彼多罗岛之南屏镇”（即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

距澳门西南约四英里，今属珠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35年随父至澳门，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所设的西塾读书。其后此塾因故停办，又逢父亲去世，容闳只好返家往来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以补贴家用。1841年在古夫人旧友霍白生医生的帮助下，容闳进入马礼逊学校读书。1847年马礼逊学校主持校务者勃朗先生回国治病，容闳与黄胜、黄宽随之赴美，先入当时在美国颇为著名的预备学校——孟松学校（位于马萨诸塞州）就读；1848年黄胜“以病归国”，而黄宽则接受香港人之资助，“赴英格兰入爱丁堡大学”，唯有容闳“甚欲入耶鲁大学”而仍留在美国。孟松学校为勤学寒士专设资助，但“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当时正在为经济问题而不知所措的容闳却决意不轻诺此等条件。“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就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

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1850年，在勃朗先生的帮助下，容闳终于得到了佐治亚州妇女会的资助，“遂束装东行，赴纽海文，径趋耶鲁大学投考，居然不在孙山之外”。在大学期间，容闳常常勤工俭学，利用课余时间为同学们提供饮膳，为校内一藏书楼管理书籍，借此所得而补给生活；容闳学习特别刻苦，“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最终“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成为了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留学生。1854年11月13日，容闳怀着自己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揣着羊皮纸制的耶鲁大学毕业文凭，从纽约登上“欧里加号”帆船开始了归国的航程，经过154天13000海里的水程，于1855年3月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从此，容闳开始苦心孤诣地筹划着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二、容闳的梦：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

1、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酝酿。

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起，至1872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派遣美国，这一时期是容闳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酝酿阶段。用他自己话说：“溯自1854年予毕业之时，以至1872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

容闳早在耶鲁大学修业期间，“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在大学的第四学年尚未毕业时，他“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立下派遣留学生的鸿鹄之志。他后来追忆：“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

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然而，当他匆匆回到祖国后，由于多年阔别没有任何根基，甚至连本国语言也“几尽忘之”，因此他不得不把“谋食”和“谋道”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自己宏大的理想和愿望，他重新补习汉文，并达到“谈话无虞扞格”的状态，“于是颇思于社会中得一职守，此非仅为家人衣食，欲有所藉手，达于维新中国之目的”。在实践生活中，容闳践行着自己的信念，始终没有忘记远大的鸿鹄之志，始终深信推行派遣留学生之“教育计划”是“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并时时刻刻为之寻求机会。他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任书记，“意本不在金钱，欲藉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然而很快发现“派克虽摄公使，乃非近水楼台，与予之计划甚左”，于是辞职；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不堪忍受英籍律师的排拒，“且久居英国殖民地，身体为所拘束，不能至中国内地，与上流社会交游。纵使成一著名律师，博得多金，亦安所用之？”再次辞职；后又任上海海关翻译处谋职，薪俸颇厚，但痛感于商人与海关狼狈为奸现象，更愤慨于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仅英人充任，中国人不得与英人享有同等权利，又一次毅然辞职。同事诸友不能理解他“弃此二百厚俸，图不可必之事”，而容闳却认为他们“是燕雀不知鸿鹄也”，“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子学，即多获一份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在其经商期间，了解到诸多商家内幕和经商方法，目的却在“于他日事业，关系实多”；当他以译书自食时，“纵不得多金，固大可藉此以多识商学上流人物，推广交游，以遂予之第一目的”；

1860年，他与曾兰生及两传教士去南京游历，意在探太平军内幕，途中颇受感触，并与干王洪仁玕详言“七事”，其中四项与教育相关，但他很快就察觉“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因此，他失望而返。“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至此，容闳不得不转而从商，以为有极巨资财，则藉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1863年，应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藩之邀赴安庆商议西式机器厂问题，当曾国藩问及“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本认为教育计划可谓最重要最有益之事，但从长远考虑，他还是迎合了曾国藩，“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之后就受任出国购买机器，但他始终“自念今兹所购办机器之事，殆为一种应经之阶级，或由此将引予日夕怀思之教育计划，以渐趋于实行之地也。”成功购买机器回国后，1867年曾国藩前往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陪同他参观各种机器运转并说明有关应用方法，曾国藩“见之大乐”，趁此机会，容闳劝其于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授之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将来不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这一想法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加赞许，并于不久付诸实施。这使容闳倍受鼓舞，征得旧友——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赞许后，将教育计划撰为条陈四则，请丁日昌转奏朝廷。具体内容为：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容闳自言“此条陈之第一、

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予友谓予，官厅批答公事，例有准驳。吾与以可驳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第二，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于此，足见容闳之谨小慎微、用心良苦！不料，上奏两月后，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先是因母亲病逝而退职居丧，后又去世，这一教育计划因此而被搁置。然而，容闳遭受这样的打击后，仍然不渝其志，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予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亦安能无怏怏哉！失望之久，焮馀余热。自1868年至1870年，此三年中，无日不悬悬然不得要领。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并恳请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此后不久，天津教案事发，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四人交涉处理此事，丁日昌电召容闳协助翻译，于是“因此不幸之结果，而引为实行教育计划之机会”。

就在容闳为实现自己的宏愿四处奔波的期间，国内外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政府于1862年开办了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也相继诞生。1867年，为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兼学外语与西学，并聘请外国教习等问题，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争论，结果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终。与此同时，1866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经过丁日昌的游说，加之容闳的“西学东渐”主张也符合曾国藩（准确地说是洋务派）“求强”的意愿，因此这一计划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最终于1870年冬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至此，历经16年的酝酿与准备，容闳

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终于成为现实了。42岁的容闳为此兴奋不已，准备着大展鸿鹄之志，“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事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2、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实施及破产。

容闳的教育计划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后，随即前赴南京与曾国藩商议相关事宜：①派出洋留学生之数额，暂定为120人，分四批，每批30人，按年分送出洋，年龄在12到15岁之间；②在上海设立一预备学校，幼童考试及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③筹定留学经费，由政府出资；④酌定出洋留学年限为5年；⑤成立留学事务所，设监督2人，汉文教习2人，翻译1人。当时，由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任副监督，陈兰彬“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并为学生预备寄宿舍等事”，经费则由二人共同掌握。

直到1871年夏，仍未招满第一批学生，容闳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明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由于当时中国尚无报纸传播新闻，北方地区的人大多不知道派送留学生一事；而且，在当时出国留学并不是光宗耀祖之事，国人习惯于长期锁国，并不知道国外之情形，只以为路途遥远、险恶难料，家境颇好者决无送子出国之意。因此，此次选拔的30名幼童多为南方人，亦多为家境贫困者。

这样，1872年夏季之末，第一批留学生30人，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了。直到1875年，共有120名幼童先后抵美并在留学事务所的安排下开始读书。期间，1874年清政府应留学事务所之请求，在哈特福德的克林街建造了永久办公楼。对于此事，容闳说：“予之请之于中国政府，

出资造此坚固之屋以为办公地点，初非为徒壮观瞻，盖欲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冀将来中政府不易变计以取消此事，此则区区之过虑也。”由此可以看出，容闳是何等殚尽竭虑地经营着自己多年的梦——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又是何等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一已成现实的梦。

按照容闳的计划，幼童们被安排住在不同的美国人家中，并进入当地公立小学或中学学习。同时，还要兼习中文课，学习孝经、五经及清朝律例等；每逢节日，还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望阙拜跪。在“住美国家庭、进美国学校、读美国书、和美国孩子玩”这样潜移默化的环境下，幼童们很快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留学幼童年龄和学识的增长，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思想，逐渐对留学事务所的封建管理方式产生了不满，并时有矛盾发生。对于身为翰林且“当未至美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的陈兰彬来说，这些均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不正当之举。而深受西洋文明教育浸润的容闳却每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允”时，总是“代学生略微辩护”。这样，正副监督之间日渐发生不合。1874年，陈兰彬请长假归国并辞去监督之职。之后由区岳良任监督，1876年又由吴子登任监督。吴子登也是翰林出身，“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不断向清廷打小报告，极端夸大留学生西化的倾向，“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也正当此时，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议案，容闳向美国政府提出输送优秀学生进入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的申请遭到拒绝。在这样的背景下，1881年6月8日清政府接受吴子登、陈兰彬的建议，下令结束

留学生事务所。在容闳的努力下，当时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其中提到“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诸生言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况贵政府当日派送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以习中学？……某等因对于素所敬爱之贵国学生，见其忽受此极大之损失，既不能不代为戚戚；……愿贵衙门三复此言，……更从实地调查，以期水落石出，则幸甚幸甚。”尽管这份请愿书得到了美国教育家、大学校长、学校教师等诸多人员的签名，但对于清政府也终就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1881年9月6日，120名学生及有关工作人员凄然归国。爱国诗人黄遵宪深表惋惜，写下《罢美国留学生感赋》：“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遣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去，万感心伤悲。”而容闳更是倍受打击，“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顿觉心灰，无复生趣。”他可谓步履艰难、势单力薄，纵使为挽救这一结局费尽心力，也最终无济于事。经过了16年的长期酝酿，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容闳的希望和努力全成了泡沫！容闳的梦最终破灭了！

三、时代造成容闳的双重人格：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破产的重要原因

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失败，从客

观方面讲，与当时国内国外的大环境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这一点，各类著作与文章中已有诸多阐述，在此不再赘述）；而从主观方面讲，则与容闳本人尴尬的“边际人”角色有着极大的关系。今天，我们回首历史，以一种客观中允的态度来分析，会发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当时的容闳在无意中扮演着“美国的中国人”和“中国的美国人”之角色。

容闳在美国接受了小学至大学的系统教育，他完全接受了美国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他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娶了美国女子为妻，“他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但是，容闳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始终把美国作为自己的“第二祖国”，终身都保持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而且他四处奔波的一生中无时不刻地体现着其深厚的爱国情感和强烈的爱国责任感。当他面临着严峻的经济窘迫时，由于满怀爱国激情而没有接受以成为传教士为代价的资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愿；毕业后，他放弃了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举步维艰而又坚持不懈地推行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是他“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当他路遇醉酒西人侮辱中国同胞时，婉言告之“凡美人至中国，尤当自知其所处地位之尊贵，善自报惜，不宜有强暴行为以自丧其名誉，而伤中国人感情”；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他怒打了一位“体量高六尺余，雄伟无伦之苏格兰人”；他痛恨外国侵略者的横行，于是向太平天国提出七项建议；他投身洋务运动，出国购买机器，并翻译国外著作，希企中国从根本上摆脱列强的压迫，最终走上独立富强之路；当他不遗余力地推行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

时，更是为祖国储备人才；他参与维新变法并最终走上革命之路，都是其报效祖国的爱国实践；《西学东渐记》一书是他晚年回顾自己“西学东渐”之志，寻求“维新中国”之路，却又屡遭曲折磨难之遏的生命历程，是他在弥久弥新的爱国心驱使下对祖国前途和命运忧心瞩目的产物；直到1912年病危弥留之际，仍在深深念及祖国，嘱咐两个儿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正如梁启超拜访他之后所言：“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而他的美国朋友吐依曲尔则这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因此，在美国人眼中，容闳确实是具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容闳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他自身的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位不幸的人，因为在他被美国人看作是“具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的同时，祖国同胞则把他作为“中国的美国人”来对待。他多年求学于西方，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隔膜，甚至“于本国语言，几尽忘之”。在归国的路上，当他“默念此暗礁与沙滩者，中国语不知当作何辞，久思不属，竟莫达其意”时，令别人笑得前俯后仰，而自己“亦无词以自解”，颇觉尴尬。因此，他不得不花费时间补习粤语和汉语，但始终不能自如地运用书面汉语，每写条陈都要请人代笔。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精神素养的不同，使得当他满怀报效祖国的激情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时，“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容闳对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也了解甚少，当他认为《契约论》对中国很有用而想翻译此书时，于“中国政界事务亦甚谙练”并帮助他翻译的文士劝他不要翻译此

书，由于不适合中国的情势，即使译了，销路也不会很好；当他与黄开甲合译了美国银行律，并参照它起草了中国国家银行计划，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却认为“其中若干条，不合于中国国情，难期实行”，翁同龢也如此认为。由于容闳出身贫寒且长期在国外，既没有世家贵戚，也没有同窗师友，尽管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近达官贵人，却并不尽如人意。得益于丁日昌和曾国藩的鼎力帮助才使他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得以付诸实施，因此容闳对丁、曾二人感激不尽，推崇至极，然而在组织留学生事务所时，精通西学的容闳只能任副监督，正监督则是出身翰林的陈兰彬。对于这样的安排，丁日昌解释为：“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而李鸿章则如是解释：“纯甫（容闳）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陈兰彬）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功也。”而背后的事实是洋务派对在他们看来是彻头彻脑的洋人的容闳根本就不信任。以至于后来，李鸿章批评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甚至认为“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之颠扑不破。”容闳终生颇感自豪的“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身份和“得美妇以为室”、信奉基督教、登记美国国籍等比较开放的行为，都成为了妨碍他完成自己宏愿的负面因素。他的美国老朋友吐依曲尔也说：“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可见，在国人的心目

中，容闳又的确是具有中国身份的美国人。

正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环境，赋予了容闳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导致了他难以介入晚清的中国社会，清政府不仅不能完全信任他，而且还无端地猜忌和制约他，也导致了容闳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无法恰当处理洋务派“中体西用”和实质性西学的关系。这样，他的宏愿、他的事业，无法脱离现实处于真空中，无法避免最终的失败。

四、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意义

容闳苦心经营多年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夭折了，但其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举足轻重的。就这一点而言，容闳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并没有失败。

首先，容闳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开创了中国人官费留学教育的先河，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

鸦片战争的炮声，促使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清政府的大小官员们也不得不调整姿态，他们不再以“天朝帝国”的身份自居了，也不再视西方的实用技术为“雕虫小技”了，他们不得不被动地去对付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也不得不被动地接受着、学习着“西学”。在这期间，虽然有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冯桂芬呼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但是他们都并不真正了解西方，他们无法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系统思想。而容闳与他们不同，他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文明教育，受西方文化影响非常深刻。他不仅在理论层面提出了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方法及途径，并且通过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使之付诸实践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首创之举，为之后的留学教育和西学东渐开创了一个先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随着科

技及外交需求的变化，留学教育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1875年，福建船政局派出第一届留学生35人赴欧洲学习；1881年，又派出第二届10人分赴英、法、德三国学习；1886年，派出第三届34人到英、法学习；1899年官费、自费留日的中国学生有200多名；1903年，留日学生有1300余人；1906年高潮时，达到8000名上下；1909~1929年间，进入美国各高等学校学习中国留学生达到5013人，在当时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总数中占比较大的比例，其中女留学生达538人。而且，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与当年留美的幼童相比，后来的留学生们再也没有被规定必须“望阙行礼”或向至圣先师神位“一体行礼”，再也没有遇到那种矢如雨集的诽谤和中伤。可以说，以容闳当年的挫折和失败为代价，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和向西方学习的观念终于汇聚成一条长河了。容闳自己在《西学东渐记》中，也颇为欣慰地写到：“1872年那批留学生的仅存者中，有几人由于艰苦努力，勤奋不懈，终能跻身于中国最重要的经世之才的前列。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原先的留学事务所也复活了，虽然形式上已有变更。因此，如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生翩翩联袂，从遥远的海角天涯，来到欧美接受科学教育。”而且，我们不能不说，留学教育的深入发展，对于中国教育和社会的近代化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贡献。

其次，容闳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确实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

近代史上，中国社会发展缓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人才，缺乏接受先进教育、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容闳极力推行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了，但客观上还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别于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新型人才。120名留美

幼童中，除了死亡、中途撤回和留在美国不回来的外，其余 94 名回国学生中，学籍可考者 87 名，其中小学 19 名，中学 35 名，33 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后，他们大多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为中国近代铁路、邮政、矿业、电报、医药、商业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铁路方面：詹天佑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为中国修建了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并担任过许多铁路的段务工程师、咨询工程师、局长等职务；梁如浩任关内铁路运输处处长，负责建造京汉铁路通往皇陵的“西陵支线”；钟文耀负责监造沪宁铁路，后任局长、总办等职；黄仲良任沪宁路局长、粤汉铁路副总理及津浦铁路局长等职。在政界：唐绍仪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促成南北议和；梁敦彦 1911 年出任首任交通总长；梁如浩民国以后担任外交总长；吴仲贤 1883 年出任韩国仁川元山领事，后任神户、大阪领事及横滨总领事；蔡绍基曾任北洋洋务总办、北洋大学校长；刘玉麟曾任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驻英公使等职；周寿臣曾出任外务部参事，后任香港华人议员，担任香港太平绅士，被英国人晋封为爵士；容揆任中国驻美公使馆秘书；张康仁任中国驻旧金山、温哥华及西雅图领事；欧阳庚任旧金山、巴拿马领事，印尼总领事，中国驻智利公使等。在海军界：有 17 位，其中蔡廷干和吴应科被任命为海军元帅。在矿业、邮政业、电报业界：吴仰曾任开平煤矿工程师；邝荣光成为了我国近代最早的采矿工程师；邝炳光撰写了专著《金银冶金学》一书；唐元湛任邮政总局提调、邮政总局上海分局总办、上海电报局局长，对近代邮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陶延赓任湖北省电报局局长；程大业任满州里电报局局长；周万鹏

任全国电政总局局长。

这些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历经了中国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他们既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留学教育的复兴和深入发展。

再次，容闳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

不论是容闳本人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建立家庭，还是归国后努力推行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这些都对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1847~1854 年，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报道、研究和了解还比较少，对于当地的美国人来说，容闳就代表着中国，他们通过了解容闳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解有关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种种信息。在读书期间，容闳通过自己的勤奋刻苦赢得了美国人的赞赏和敬重。1854 年，容闳的毕业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件大事情，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特别是哈特福德城的布什内尔博士因为在报纸上读过容闳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而要求与其相识。而容闳在毕业时给同学的赠言中曾用毛笔写下这样的话：“礼之用，和为贵”，“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有志者事竟成”，“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等。而容闳的美国同学给他留下这样的赠言：“当大海阻隔在你与你的耶鲁求学生活情景之间，当英语对你重新成为夷言，当你带着惊讶回顾你曾摆脱天朝羁绊而度过的这些岁月，当你重新习惯于看小脚女人和垂辫男人时，请不要忘记来自我们这里的善意，你曾留下众多友人，他们对你的记忆将永远不会磨灭。请相信我的话，我将时时怀着感激与骄傲来回忆我们四年大学生活所建立的友谊。”而且，容闳还向耶鲁大学赠送一些

图书，如《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李太白全集》、《大清中外一统舆图》等。由此可见，容闳不仅自己了解、吸收了美国的西洋文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递给了美国人。

实施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更加有利于中美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中美之间的外事交流。留美幼童很快就适应美国的语言和生活环境，很快就与美国同伴打成一片，这本身就是中美文化交融的体现。当幼童将被撤回时，当时耶鲁大学校长起草的请愿书中这样写到：“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至某等授于贵国学生之学问，与授与敝国学生者不少异，绝无歧视之心。”虽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定就标志着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一直没有派出驻美官员。容闳带领幼童赴美读书时，几乎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美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而容闳本人后来也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副公使。也就是说，是容闳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为美国政府和民众提供了了解中国机会。

可以这么说，容闳的求学经历和他倡导的幼童留美活动，增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及中国人的了解，增进了中美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活动。

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也是倡导官费派遣留学生的创始人；容闳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而且始终保持着顺应历史潮流的心态；容闳长期留学在外，却始终坚贞不渝地固守着拳拳赤子之爱国心。造

成容闳悲剧人生和双重人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容闳的精神，容闳的爱国情结，容闳对于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却是永存的，却是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和美国朋友传承并发扬光大的。在容闳于耶鲁大学毕业150周年之际，我们在缅怀容闳，缅怀容闳为中国近代教育和近代中美交流所做贡献的同时，也希企中美之间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能有更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 [1]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1) [M]. 北京：三联书店，1957.
- [2] 黄遵宪. 人境庐诗草笺注 [M].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63.
- [3]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 [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4] 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M]. 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 [5] 王炳照、阎国华主编. 中国教育通史(5) [M]. 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 [6]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7] 汪波. 容闳与近代中国早期的外交 [J]. 安徽大学学报，1996. (6).
- [8] 章开沅.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耶鲁馆藏容闳档案简介 [J]. 浙江社会科学，1999. (1).
- [9] 李细珠. “边缘人”的角色尴尬——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 [J]. 学术论坛，2000. (3).
- [10] 钱钢、胡劲草. 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M]. 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